

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

侯云灏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众流竞进,异彩纷呈。众多史学流派的存在,是此期的一个独特现象,抓住这一特殊现象进行研究,对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全面认识和 21 世纪未来史学发展趋势的展望,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 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的研究,已陆续有一些力作问世,令人欣喜。但是,没有专门从史学流派这一独特视角立论,来研究中国现代史坛,又留下一些遗憾。笔者不揣谫陋,草成此文,以求教于诸位专家。

一、史学流派的客观存在及其划分

20 世纪前期是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 50 年。关于此期史学流派的划分,标准不一,众说纷纭。代表性的意见有冯友兰提出的疑古、信古、释古说,后来被齐思和采用;有钱穆提出的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之划分;有周予同提出的史料派、史观派划分;还有许冠三提出的史学新义派、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史建学派等划分。这些划分各有道理,体现了他们对现代史学的理解和把握,颇具卓识。然而,也有不少问题。比如:疑古派并非一味地疑古、破坏,也有建设的一面,且不说破坏自是建设的必要环节。顾颉刚解放后倾全力专治《尚书》,目的即在于重新建设可信的上古史,是始于疑而终于信。考古派、信古派也都有疑古的一面,释古派更是兼具三者,有疑、有考、有解释。至于史家的具体历史认识,是疑、是考、还是释?更是说不清。就史料派、史观派之划分而论,就更有问题了。因为史料是史学工作的基础,史观又是史学研究的灵魂,两者缺一不可,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必须于两者均有极高的造诣,才能取得大成就。假如各执一端,说史料派没有史观或用不着有史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乾嘉诸老,举手投足之间也都是贯穿着某种通识在里面的,也是有史观的。像戴震、钱大昕这些大家,甚至对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等都有极高的素养。至于说史观派,要想有所建树,更离不开史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在冯氏和周氏分派方法影响下的许冠三也难免顾此失彼。至于说传统派是记诵,考订派是科学,而革新派的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1 年版;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1949 年 10 月。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第 3 页。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 4 期,1940 年 2 月。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史学只是一种宣传,问题就更多了。

20 世纪前半期学派林立,异彩纷呈,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到底如何概括这些学派,是按照地域、学术宗旨、学术阵地,还是根据对中国史学内在发展逻辑的把握,几种划分标准,各有利弊,莫衷一是。但是,这些学派又亟待总结,与其强以综括,倒不如以史坛原来的局面,就事论事,把事实先摆出来,等待将来继续研究。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初步认为,此期的中国史学流派大致可分为: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国粹派、食货派、保守派、史料学派、生机史观派、生物史观派、战国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等 12 个学派。

二、各史学流派的学术概貌

新史学派 新史学本是相对于旧史学而言的,在这里,新史学是指 1902 年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之后,以“史界革命”为职事,区别于封建旧史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这个学派是诞生最早,对 20 世纪前期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影响了中国几代的史学家,梁启超确实开近代新史学之先河,是新史学的奠基人和代表。梁氏提出“史界革命”,在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基础上,对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价值进行了重新界定,建立了新史学的基本框架。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有四弊、二病,是以帝王个人为中心的君史,不是反映人群竞争团结之道的民史,否定了旧史学的道德伦理标准,批判了封建的正统思想。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问题。他说:“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从认识论的角度初步解释了历史学的性质。在史学的研究对象上以叙述人群进化为宗旨,通过这些现象以求得公理公例。史学要想成为科学,要揭示人群进化的规律,必然要吸取如哲学、社会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积极成果,特别是要借鉴统计学方法于历史研究。从价值论上看,梁氏认为可以借过去之进化,指导未来之进化,可以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梁启超以其崭新的近代史学观念,再加上他笔端常带感情的流畅语言,对后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古史辨派 1923 年,顾颉刚在《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宛如投石击水,掀起了史学界的轩然大波。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罗根泽、董书业、吕思勉等人,以疑古相砥砺,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对“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古史体系,进行系统的怀疑,与信古派展开了激烈地论战。后来,顾颉刚把这些论辨文章和信函编辑成册,以《古史辨》名之,交由朴社出版,共 7 册 9 本,故称这个学派为古史辨派或疑古派。顾颉刚是北大胡适的学生,胡适于中国现代史学以其实验主义的方法和科学观念,对时人影响颇大。胡适的治史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特别是他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假设存疑的思想,实际上,直到今天仍被大多数人采用着。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有三层意思: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我们在这上,即不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要做三种书以辨清伪史源、伪史例、伪史对鞫。他们的工作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史辨派胡、钱、顾的史学观,有所承受,不过更进一步作大胆的思想罢了。但其研究的范围仅及于秦汉以前的古史,而且停留于纸上谈兵,古史辨结果成了古书辨。同时,他们也免不了有若干主观的成见。不久就引起信古派和考古派的批评。

南高派 这是在与疑古派论辨中产生的一个学派,以柳诒徵、缪凤林、刘掞藜、郑鹤声等为代表,这些人大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故称南高派,因其以信古为中心,又称信古派。该校的《史地学报》是他们的主要阵地。信古派坚持以先儒的学说和经典的常识,竭力反对“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疑古学说。柳诒徵认为古今共信之史籍,古圣先贤从未怀疑过,今日岂可妄诬轻疑,将古书一概抹杀。他说:“今人读古史动辄怀疑,以为此为某某作伪,此为某某增窜,嚚然以求真号于众;不知古人以信为鹄,初未尝造作语言以欺后世。若谓始善考史,昔之人皆逞臆妄作,则由未读古书,不详考其来历耳。”并且讽刺疑古派失之肤浅,疏于读书,甚至要他们“去熟读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来议古。刘掞藜自称对古史应采取“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的态度,不要妄自怀疑。他们的治学方法,主要是继承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传统,采取考信于六艺的态度,对历代儒家传播的经典深信不疑,皆作为史料看待。选择史料以古为尚,认为只要找到了史源,有了最早的记载,就不烦考而信矣。柳诒徵还在其《中国文化史》中,集中阐发了他最有代表性的三代至上的文化史观。信古派食古不化,被胡适讥为“仅仅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辩护士”。显然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了。但是,信古派成员大多以维护传统自居,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向疑古派发难,也是对当时民族虚无主义的必然反应,是一种消极的抗争。

考古派 对疑古派提出质疑的不只信古派一家,考古派也有委婉的批评。考古派以王国维、李济为代表。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被陈寅恪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氏是第一位运用甲骨文考证古史的学者。他对于史学不愿意加入历史方法论的论争。在《古史新证》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以下均此版,第280页。

《古史辨》第1册,第70页。

参见蒋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渝版,第109页。

柳诒徵:《正史之史料》,《史地学报》二卷3期。

参阅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读书杂志》13期,此处转引自《胡适文存》第2集,第74页。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文存》第2集,第77页。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

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针对疑古派,他说:“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疑古不等于将传说一笔勾销。他论述自己的方法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于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于今日始得为之。”李济从事于仰韶文化的研究,有《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于是地下的史料由甲骨而扩大到铜器、陶器及其他,由“甲骨”的名称,扩大到“小屯文化”、“白陶文化”的研究。考古学派对于古史的态度审慎而不肯轻易下判断;既不轻疑,也不过信,以二重证据法,求得证据,建立可信的古史系统。

国粹派 1905年初,“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出版《国粹学报》,设立藏书楼,并准备建立国粹学堂,在学术界广泛开展活动。次年6月,章太炎出狱,宣布要“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并在《民报》连续发表宣扬国粹的文章,在东京成立“国学振起社”,自任社长,主讲国学,发行讲义,与国内的《国粹学报》遥相呼应,形成一股强大的国粹主义思潮。团结在这股思潮周围的人,组成国粹派,其主要成员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马叙伦等人。国粹派谈学术而兼涉革命,史学是其主要内容。章太炎说:“国粹以历史为主。”国粹史学批判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对历史多有歪曲,无信史可言。但他们批判旧史学与新史学派的过激言论不同。章太炎认为,中国旧史学尽管有弊端,但它源远流长、体例完备、记叙周详,远较其他国家为发达,并不能一笔抹杀。在他们看来,新史学应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应重视国民全体的社会进化史。他们借旧史中“夷夏之防”的种族思想,宣扬民族主义,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粹派的这种民族思想更加强烈。强调史学的目的在求真之外,应有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猾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孔子不有《春秋》,前人往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

食货派 食货派是指团结在《食货》杂志周围的一些学者。《食货》半月刊于1934年12月1日创刊,陶希圣任主编,1937年抗战爆发后停刊,共出61期。同时还成立有食货学会作为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组织。这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背景下问世的。该刊的宗旨是: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史学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史学也离不开史料。史学要有理论、方法的指导,但理论、方法不能代替史实。声言:“把方法当结论,不独不是正确的结论,并且不是正确的方法。”强调理论和方法非先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转引自蒋祖怡:《史学纂要》,第111页。

章太炎:《演说录》,《民报》1906年第6期。

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页。

参阅蒋祖怡:《史学纂要》,第112~113页。

陶希圣:《食货》半月刊,第1期,《编者的话》。

取得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食货派诞生在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之后,既是论战的一项积极成果,又把论战引向了深入。他们比较早地重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保守派 以钱穆为代表。钱氏在30年代中期所撰《国史大纲·引论》中,把现代史学分成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认为传统派主于记诵,革新派急于革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科学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革新派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然革新派之于史学,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甚至于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的历史材料,也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对于历史,即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也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他们对史实往往一无所知。所谓系统,也不过是空中楼阁。随使史学沦为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而他主张“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但是他对旧史学一味颂扬,对以往历史抱有一种恒具之“温情与敬意”。而且把对封建旧史学之应有的批判视为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中国旧史学在钱穆眼里简直完美无缺,封建社会真该传诸万世而不朽了。所以,直到他身后,著作的出版仍坚持采用竖版繁体字,纪年也不用公元纪年。因此,我们把以他为代表的史学派,称为保守派。

史料学派 傅斯年1926年从德国回国以后,先是在广州中山大学建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出版周刊,1928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号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主张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便不说话。材料之内发现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声言史学便是史料学,以史料为中心,号召史语所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开始了大规模地搜索史料的工作。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一文中,他进一步提出:“(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在文章最后,他提出三个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以史语所为核心,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主要阵地,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史语所同仁从事田野考古发掘,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到民间进行方言调查和采风,开展集团式研究,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史料学派。

生机史观派 以朱谦之为代表,流行于30年代。朱谦之服膺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思想,对历史学有新的理解。他认为历史著作,无论是哪一个朝代的,都充满着战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钱穆:《凡读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国史大纲》,第1页。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56~258页。

争的故事,都是无关社会生命的事情,是“堆积”起来的,那不是历史。历史应该是“(1)叙述进化现象的;(2)叙述一种生机活泼的动物——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的;(3)叙述一种生机活泼的动物——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历史就是“由原始而现在而未来的不断的生命之流”。他把历史分为“堆积”的历史与“进化”的历史。认为变化之为总和的、偶然的,曰“堆积”;变化为全体而有互相关系者,曰“进化”。“历史的意义即取决于它是‘堆积’的,还是‘进化’的,前者是物理的变化,后者是生机体的变化,所以历史必须像自然界的蛙卵一般,合于生机主义,而后才有历史的意义可言。”由此,朱谦之认为“历史的原动力,决不在于施行残忍政治和激成民族仇怨的强权阶级,或少数的英雄;而在全体社会的知识线上的活动的体相。”又说:“本能在人类历史中是头等重要的原动力”。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内部的生机力。朱谦之的主要代表作是 1926 年泰东书局出版的《历史哲学》和 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哲学》。

生物史观派 以常乃德为代表。常氏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必要阶段。社会进化的轨迹和模式,受生物学法则的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同生物演化的过程一样,也经历了四个阶段:(1)家族社会阶段,亦称血缘关系为中心的社会;(2)部落社会阶段,社会是酋长制;(3)民族社会阶段,已有政府、国王和复杂的民族意识;(4)国族社会阶段,即近代式的国家社会,其特点是国族意识及国民性成熟。以生物进化史比拟人类社会。由此,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常氏看来,是民族性,“民族性为支配一切历史动态之总原因”,是“整个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具有规定全体文化形态及性质的能力。”民族性就是国民性,就是整个国民的嗜好、习惯和趋向,它是一种集团精神,其本身即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环境之抽象的综合的代表。这种民族性(国民性)受先天遗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三种要素的影响,其中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常氏宣扬生物史观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唯物史观。

战国策派 亦称文化形态学派,产生于 40 年代,以林同济、雷海宗为代表。他们运用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认为文化像有机体一样有生长、老、死的过程,与此相应的,文化经过封建时代、列国时代(包括贵族国家时代、战国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然后走向衰亡。他们认为历史文化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是各自独立产生与自由发展的;文化发展是有规律的,不同的历史文化,拥有共同的形态,共同的发展规律;正因为不同文化有共同形态、共同的发展阶段,所以,不同文化虽各有独特性,但又是可以比较的。根据这一原理,雷海宗提出了中国文化两周论的说法。他们不局限于学术理论的探讨,更重在针对现实问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灭亡中国的背景下,这些学者也为此开出了自己的“处方”,认为抗战时期就是大的战国时代,要有能为战国之战的一切本领,中国文化能否获得新生,全都在此一战。为了宣传他们对历史、现

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图书局 1926 年初版,第 10 页。

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图书局 1926 年初版,第 63 页。

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图书局 1926 年初版,第 23 页。

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图书局 1926 年初版,第 147 页。

常乃德:《生物史观与社会》,《常燕生先生遗集》第 2 卷,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501~511 页。

实和学术、政治的种种主张,林同济、雷海宗等人1940年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1941年停刊,共出17期。1941~1942年又在重庆《大公报》办《战国》副刊,共出31期。因而被称为“战国策派”,曾以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学派而遭到批判。这个学派的代表作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等著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24年李大钊《史学要论》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出的史学理论著作。李氏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早在1920年所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是李大钊的另一篇重要论文。该文对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动力论、价值论均有论述,认为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初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展望。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此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郭氏运用甲骨文、金文等材料,以确凿的证据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证明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而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确立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此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均有力作出版。到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已成熟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主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就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所说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致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它包括人类社会历史有规律发展的理论即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历史动力理论,历史创造者理论,阶级分析理论等。

三、史学流派的演进特点与几点分析

我们所列举的12个史学流派,并不是本世纪前半期史学流派的全部,但大部分已包括在内,并具有典型性,可以基本概括此期的史坛。从这12个流派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1)学派繁多,异彩纷呈。从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到释古派(包括唯物史观派等),以对历史的态度或对历史的观念上说,几乎无所不包。从历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史料、史观的关系上说,有史料派、史观派,也有史料、史观并重派。从当时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潮上看,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本格森的生命哲学、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鲁宾逊的综合史观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且在史学领域,均有相应的反映。从史学的阶级属性上说,有资产阶级新史学,也有守旧派史学。从史学的专业领域上说,有专重政治史的,有专重文化史的,有专重社会经济史的,也有偏重思想、学术史研究的,还有偏重理论、方法研究的。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小的流派如动力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

《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4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704~705页。

派、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学衡派、文明史学派等等。他们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的虽不是纯史学流派，但所谈内容又离不开史学。种种现象都说明，本世纪前半期史学流派繁多，异彩纷呈。(2)众流竞进，昙花一现。流派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因为这些学派的老家，多在国外，涌入中国之后，忙于经世济人，而这些流派的创始人，多到中国来过，并在全国各地巡回讲演，泰戈尔、杜威、杜里舒等，这些名字一度成为中国学人崇拜的偶像。而中国人为了寻找摆脱困境之路，正有饥不择食的欲望。这种背景助成了那些学说的众流竞进之势。然而，这些学说及其在中国的传人，很快成为过眼烟云，昙花一现。比如，生机史观也仅仅是朱谦之写了一本《历史哲学》后，一两年之内就销声匿迹了。生物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都不超过五年。这又构成中国史学流派的一个显著的特点。(3)这些流派几乎全部是舶来品。对梁启超影响大的有浮田和民、坪井九马三、孔德、李凯尔特等，影响王国维的有叔本华、尼采和孔德等，影响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是斯宾塞、孔德，影响胡适的是杜威，影响朱谦之的是本格森、杜里舒，影响林同济、雷海宗、常乃德的是斯宾格勒、汤因比，影响傅斯年等人的是兰克、莫姆森(蒙森)，影响李大钊、郭沫若等人的是内田银藏、马克思、恩格斯等等，不胜枚举。(4)30年代以后出现的史学流派，多反对唯物史观。30年代以后唯物史观与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显示出巨大威力，引起许多人的恐慌和反对。比如常乃德专门写了《生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比较》一文，处心积虑，极尽贬低唯物史观之能事。常氏认为生物史观是纯粹由科学观点出发的，而唯物史观却使用黑格尔的玄学演变来的辩证逻辑，故未脱尽玄学的窠臼。贬低对方，抬高自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另外，如民生史观、生机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等，也都把理论的矛头指向了唯物史观。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流派有上述一些特点。特点即是特有的倾向，特点极处即是问题所在。那么，从史学流派及其特点这一特殊视角来看，这50年的中国史学存在哪些问题呢？

第一，为什么此期学派林立，却难于以一个统一的标准划分呢？这12个学派以地域、杂志、宗旨等不同标准划界，头绪紊乱。而各种划分本身又存在很多问题。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大概有：(1)这些学派各有所宗，并且都是些洋学说，本来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没解决好，有的学派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还没有彻底成型，有的学派其宗旨并不清楚，就消失了。学派存在时间短暂，来不及找准自己的定位。也给后人的认识造成了困难。(2)各学派虽各有所宗，但都是为了在中国的大地上救世济人，所寻觅的妙药良方，都有经世的目的。要经世就要政治上有所依附，使思想学说变成行为实践，学术之争实际上就变成了政治斗争，使本来就不甚清楚的各学派，变得更加扑朔迷离。(3)今天，我们研究得不够，认识水平的局限，也是造成对史学流派把握不准的重要原因。

第二，为什么对外来思潮如此贪婪的吸取，急不可耐？19世纪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传统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地动摇，价值观念有不同程度的失落。20世纪初民国的建立，虽然推翻了一个清朝的封建皇帝，但社会的陈旧势力，人们的思想、学术、价值观念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旧的打破了，新的尚未建立起来，就在这种文化真空中，各种外来思想如潮水般涌入是自然的，而急不可耐地贪婪汲取亦是不难想象的。

第三，众多学派昙花一现，说明了什么？历史上凡“舶来品”，都有中国化的问题，谁本土化得好，谁就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史学如此，文化发展的规律亦如此。文化发展，现代

学术的建立,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自我欣赏,当然不行;但是,不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今天萨特,明天杰姆逊,后天是后殖民主义,像万花筒一样,不独不是正确的途径,并且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事,发生在成长中的一代青年身上,就更值得我们忧虑、警惕。陈寅恪游学欧美十几个国家近20年,深谙于中西文化,他在谈到文化发展时说,文化发展必立足于本民族的土壤,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统绪。这是多么深沉地感慨和忠告啊!立足于本国实际,扎根于民族的沃土,又具有宇宙之光的普照,才能开出健康、娇艳的花朵。生物史观、生机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等等,其学说未必没有合理的内核,为什么昙花一现?原因就在于此。

第四,这12个学派都不同程度地讲到了规律,不管是社会进化的因果关系,生产方式的有规律更替,还是以生物有机体比附人类社会,都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在讲规律,为什么?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这不能不说到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了。世纪初,从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科学)”、科学救国、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胜利到实证主义、科学史学,直到本世纪前30年,考证史学独霸史坛,形成史家不搞考据即不足齿诸史林的局面,足见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影响之大。华裔学者郭颖颐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对此论述颇详,此不赘述。

历史学是一种科学,揭示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性,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抓不住这一根本任务,就没有完成历史认识的全过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我们必须明确反对把历史学降低为史料考订学的做法。但是,科学主义登峰造极,其负面影响就渐次显露出来。就史界而言,讲规律、讲考据、讲必然性过多,忽视了历史解喻、史家主体意识、史学理论、历史运动偶然性和多彩性的一面,忽视了历史学的艺术性建设。这种负面影响到本世纪后半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便凸显出来,成为史学界议论和建设的重点,新时期以来许多史学现象均是对这种负面影响的反拨。这是必然的。其实,历史学从其本质上说,既要立足于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做科学的考订工夫;又要有史观,有对历史的全局把握,要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哲学眼光。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泥古不化,必须古为今用,阐发历史的意义,做艺术的建设。这几条不可偏废。关于这一点有人做过精彩论述:“历史学家是一个民族的生理学家,又是病理学家。他所作的史书,是根据解剖术所得的诊断书。这就是历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发生密切关系的原故。虽然历史作品如同诊断书,可是不能用诊断书的形式出之。所以历史学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而总其成者,还是一种哲学呢。”

第五,大体说来,史料派比史观派取得的成就多,更有价值,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原因是什么?王国维以其对甲骨文的破释,以地下出土遗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对上古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史语所先后对安阳殷墟进行十几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甲骨片和遗物,从而给上古史排出了大致的谱系。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奠定了明清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对各地方言、民俗的调查,又开方言、民俗学研究之先河。顾颉刚、胡适也以扎实的史料,推翻了伪古史体系。相比之下,朱谦之、常乃德、林同济、雷海宗等人,传世之作却不多,致使史学界对他们的名字感到比较陌生。这说明,史观派一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刘节:《历史论》,正中书局1948年初版,第65页。

忙于历史体系的建设,疏于问材料;二忙于为现实服务,现实境况一变,即成过眼烟云。更说明,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若不充分占有史料,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艰苦的科学考订工夫,没有砖瓦,基础打不牢,高楼大厦是盖不起来的,建起来也是空中楼阁。因此,史料派总是告诫人们重视每一条史料,以存一星半点历史之真,而实际上这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派的每一项工作都有其意义。因为他们给以后的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还应指出光有史料,没有史观甚至排斥史观,也是不行的。唯物史观的崛起,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斐然成就,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因为史料学毕竟不是历史学,考据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唯有在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下,科学地分析史料,从充分占有的大量史料中引出结论,才算完成了历史认识的全过程,也才是正确的认识,也才有意义。更何况,史料派本身,包括傅斯年本人甚至乾嘉诸老都不是没有历史观,只是他们不自觉地在使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一子午无论是对史料派,还是对史观派,忽高忽低地评价都是不合适的,都没把握好握在手中的这一支史笔。

第六,为什么各学派把攻击的矛头都对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派力量不但没减弱,反而愈来愈强大,影响也日益深远呢?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并非偶然,原因很多,但以下几点我以为是很重要的:(1)有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有了正确的历史观,就有了正确的方向,才能驾驭史料,把握历史的进程。否则,史料愈多,人们愈会感到手足无措。(2)有扎实的史料积累,并且不断有新史料的发现。王国维、郭沫若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成绩,就说明了这一点。(3)史学必须关注社会。古人说:“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现在和将来,考古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今。史学只有关注社会,才能获得内在的生命力。(4)学术理论的完善,正是在论战、斗争中取得的。各种史学流派的诘难,充当了砥砺真理的魔鬼。正是在论战中,唯物史观派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问题,不断地发展自己,才日益得到完善的。其实,这是学术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就等于把自己锁在铁屋子里,闭目塞听,也就窒息了自己成长的生机。

20 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逐步走向独立的历史。前 30 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危机四伏,无暇东顾,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短暂的白银时代。在这样一个经济相对繁荣,政局动荡不定的特殊背景下,学术思想却步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史学界出现了学派林立,众流竞进的局面。“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人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民族主义思潮再度燃起,此期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及其边疆地理研究计划书,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转向。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把手中的笔变成了刺向敌人的投枪。史学开始强调致用,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获得了赖以发展的内在动力。史学与社会日益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史学家也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奔走呼号声中,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作者侯云灏,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博士生)

(本文责任编辑:陈启能)

(本文责任校对:于沛)